



歷史與文化叢書

台灣後殖民 國族認同 1950-2000

盧建榮／著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25

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1950-2000

盧建榮／著

麥田出版

HS

1112
G312
197

歷史與文化叢書 25

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1950-2000

作者 盧建榮

主編 盧建榮

責任編輯 陳毓婷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2351-7776 傳真：2351-9179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2396-5698 傳真：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 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字樓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 citekl@cite.com.tw.

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3 年 8 月

ISBN：986-7691-56-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售價：320 元

Printed in Taiwan

■ 作者簡介 ■

盧建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兼任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教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專長是中國文化史和當代台灣文化史，著有《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1999）、《入侵台灣》（台北：麥田，1999）、以及《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1990-2002》（台北：前衛，2002）等書。

目 錄

自序	台灣有誠意進行殖民主義反省嗎？	007
導論		015
上篇	俗民文學中的中國性與台灣後殖民反思	019
	製作中國性：司馬翎和雲中岳及其本地追隨者	025
中篇	從威權體制到解嚴：三代台灣作家的反殖行動	065
	台灣史意識的起源：張深切和其台灣英雄群傳	071
	日帝在小梅村：張文環的故鄉寄情	103
	鍾肇政《怒濤》中的大屠殺與記憶政治	151
	陳鴻森筆下死後無家／國可歸的元日本台灣兵	197
下篇	九〇年代的弱勢族群與所面臨的後殖民情境	215
	失樂園的驚變：七年級生的身分認同	219
	失樂園中的原住民	253
徵引書文		275
參考書文		281
索引		293

自序：台灣有誠意進行 殖民主義反省嗎？

殖民主義不啓自十五世紀的歐洲白人之手，而是不分中外均有其事。殖民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慘無人道的一種暴政形式。只要群落之間互有攻伐，戰爭勝負一旦確立，勝者往往對敗方施以殖民主義的殘酷統治。東方世界帝國不斷出現，被征服的群落只有生活於殖民主義的網羅中輾轉呻吟的份。十五世紀以後由歐洲列強所擔綱演出的帝國，是一種超地域的世界強權，不僅美、非兩洲原住民部落社會落入其手，連亞洲一些老牌帝國都難撓其鋒，甚至有淪爲其殖民地者。殖民主義是不分東、西世界，也不分華、洋世界都有的現象。中文世界的歷史知識一再告誡其讀者，西方殖民主義、以及日本殖民主義分別對中國和台灣的毒害如何深，現代中文讀者卻不知其祖先曾在某個特定時代以殖民主義猙獰面目現身歷史舞台呢。漢、唐帝國毀滅多少鄰國固無論矣，台灣漢人對平地和山地原住民的宰

制和剝削，又何嘗不是殖民主義？

大家都同意殖民主義該受天譴，但大至國際小至人際的關係有時是殖民主義的具現，但施暴者卻渾不知自己所為該受天譴。近五百年來西方殖民帝國讓其殖民地的醫療和教育水準提升，拉近不少先進地區和落後地區的生活落差。即令如此，殖民主義也不能為此脫罪或卸責分毫，一點都不可以！殖民的傷害是根深蒂固的，是深藏在被殖民者的民族靈魂深處的。殖民帝國離開殖民地的那一刻起，新的悲劇又會繼踵而至。許多亞、非（洲）殖民地在白人殖民主離去之後，政治更加杌隉不堪，經濟更加依賴外人，而文化主體性益發難以建立。這就是後殖民情境，是一種比從前殖民時期更加困頓的困局和危境。

十五世紀以來在面對歐洲殖民主義攻勢的亞洲，只有中國（大陸）、日本、以及泰國倖免於難。按說，上述三國應更能珍惜他們不受殖民的運氣。泰國未發展出霸權可以不論。日、中兩國先後在上一世紀於亞洲崛起，結果她們都急著扮演殖民帝國的角色。受日本殖民的台灣、沖繩、庫頁島南半部、朝鮮、以及滿洲等地，並未發展出雷厲風行的後殖民反思，而日本更對自己當年殖民他者的歷史置若罔聞，也是一副沒反省的樣子。上述曾是日本殖民地中，滿洲人和庫頁島人已同化於中國和俄國，文化的毀滅早成定局。沖繩要獨立於日本之外雖仍猶豫不決，但依賴日本則必矣。朝鮮雖分裂，卻早已爭取到獨立和自主。只有台灣是後殖民亞洲的孤兒，她的未來行止，要依違於中國和國際情勢而定，自己作主的空間相當受限。身受未

來不確定的折磨，台灣其實比起曩昔的日本殖民時期好不到哪裡去。

近代東、西洋列強不能完全征服中國，只能在她邊陲造成局部殖民，此即葡萄牙殖民澳門、英國殖民香港、以及日本殖民台灣之所以形成。這群落入外人之手的原中國子民在感情和文化上與中國有所牽絆，乃極其自然之事。無如歷史的進展往往出以嘲諷，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發展猶落後於葡、英、日這些先前殖民帝國的發展。這是港人、澳人、以及台人對於納入中國行政管理猶有疑懼的根本原因所在。掙脫外人桎梏原是歡天喜地的事，如今變成悲劇一場。這是何等諷刺！但中國猶自不反省到這一點，只會拿收回失地、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囁語強顏歡笑。對於內地和新收地的政、經、文落差，儘管出以務實手腕允許新收地住民有條件自治以示寬宏，但此舉較諸當年法國從德國之手收回亞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極盡補償之能事，簡直是霄壤之別，更遑論西德政府之對東德新收地的寬大福利措施了。

香港約在一九九〇年才對回歸中國的宿命嚴肅以對，後殖民的反思乃應運而興。台灣在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迎上前去的竟然是前近代的專制統治的中國，台灣內部針對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反省和批判，應是戰後就開始邁步走，唯在國民黨政治高壓之下，這些後殖民反思以各種方式藏身於各類文本的字裡行間，其微言大義如今看來簡直是字字珠璣。這是本書致力發掘的所在，也是據以重建歷史的依據。這一波淵遠流長的

殖民反思是由台灣藝文界所發動，學術界在長期與威權體制形成共犯結構的年代裡，是不用去寄望這些學者的。事實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台灣學術界的後殖民主義變成主流論述之一，完全是外燦之物，是自居先進國學術邊陲、唯洋（學）馬首是瞻的一種展演。台灣藝文界自戰後以來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求一直未因強權干預而中斷，只是以隱形方式存身難以被發覺罷了。當時並沒有「台灣文化主體性」這一漂亮辭語來高標其行動，這些從事後殖民反思的論客只是身體力行。亦即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求是行動在先，文化標籤隨後才有的事。但名詞的出現雖在九〇年代之後，但人有意識的行動則是首尾貫串五十年之久的一頁歷史。

本書在寫作上，參考了十九世紀英、法帝國如何殖民非洲和印度的實例，也在認知上想與法南（Frantz Fanon）和霍米·巴哈（Homi Bhabha）的殖民論述展開對話。歷史的千奇百怪，不容我們忽視日本、中國殖民台灣的特殊性。這本是歷史專業的一項工作守則，毫不足奇。

本書寫作是繼《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一書之後往前追溯台灣人身分的多重性和流動性這一歷史過程。我自己雖定下這樣的寫作目標，但如無一些友好的催促也難以竟功。這些友好多半是學術會議的籌組人，他們提供我機會到會場宣讀我的研究成果，並獲得與會人士的回應言論，供我會後作進一步修稿之用。在此，我要感謝林富士、廖炳惠、簡笙簫、熊秉真、郭成義、以及黃克武等人士向我約稿。在會議場合對拙

文提出評論的人中，像王道還、陳芳明、陳萬益、山田辰雄、李敏勇、陳明台等人，迄今仍感銘在心。其餘與會惠示卓見予我的人，名單過長恕我不便一一道出。本書另有兩文早已刊登專刊上，分獲兩位秘密審查人提示修正意見，藉此再一次申謝。有一件事需要在此提及。有一天好友夏烈先生聽我要研究張深切，立即贈以張作《黑色的太陽》一書。這種義舉至今思及猶感窩心。希望夏先生喜歡我這本書。

近三年來因撰寫三本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機會，總會碰到一群愚妄的教授以審查身分查禁我說，古往今來的中國也是一個殖民主義國家這樣的歷史事實。這是我們欠缺反省的明證，只不過由高等知識分子而且是歷史專家來現形罷了。歷史家都沒有反省能力，又何能期望整個國家或民族有反省能力？

盧建榮序於

2003年3月1日 新店捷運市公所站旁星巴克咖啡店

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1950-2000

導論

一九九四到九五年，我一方面在嘉義梅山協助文建會作社區總體營造，另一方面在北、南兩部選五所中學進行七年級生的文化認同調查工作。在此，我接觸到鄉民社會與本土歷史斷裂的一面，同時也發現本土文化受青少年承襲的痕跡。不論是鄉民社會或是青少年次文化團體，距離文化菁英所身處的權力場域，是屬於相當文化邊陲的處境。然則本土歷史的斷裂和本土文化的傳承卻同時存在。

九〇年代的台灣，李登輝政權在文化政策上實施的是本土化運動，而本地文化菁英也同時在從事本土論述的建構工作。朝野合謀之下，本土論述大有駸駸然成為主流文化論述。這種情形對照我在社會一些特定文化角落，本土化運動的滲透力應該是偏弱的。台灣本土化運動針對的是去中國性，然而中國性卻無不遍存於台灣各種文化層面、乃至文化角落。本土化和中國性之間只能是一種對立關係、而別無其他可供營造成辯證的文化關係嗎？我內心不無疑惑。

就在一年內從台灣南部田野來回台北的路途中，我一直思索台灣本土性與中國性並行不悖的可能性。這讓我重新面對台灣本土化運動由隱而顯的歷史過程。隱性的本土論述早在威權體制時代就悄然出現。我們從六〇年代的張深切和七〇年代的張文環兩人身上，看得到本土論述的幽光和微影。這是隱性本土論述型的兩位代表。

在另一方面，本省籍的通俗文學作家中，像田歌和晨鐘兩人，在其文本中既有台灣民間社會文化的質素，即鬼怪觀和魂魄觀，又有中國性的東西，諸如氣功和漢醫醫療；既有中國地理空間上的大城、大江、以及名山在敘說中國人特有的故事，又將明明南北懸隔的故事場景縮限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社區中，彷彿把大中國給予小台灣化了。以上關於空間縮限一點，我須再加說明。田歌的小說人物可以今天在新疆，明天就讓他一下子安抵浙江雁蕩山。新疆和雁蕩山的相對位置活像在台北市由塔城街走到廈門街一樣便利。亦即，田歌只借用中國的地名，故事的場景活脫不出台灣居地的鄰里空間範圍大小。田歌的文本販賣的其實是台灣民間鬼怪文化和道教內丹氣功所具現的中國文化這樣的混雜文化符號。在這裡，台灣的本土性和中國性是可以含容並存的。

另一個台灣本土和中國性共存共榮的例子發生在東方白身上。如所周知，台灣本土化運動由隱而顯的關鍵之一便是東方白於一九八一年假《台灣文藝》以連載方式刊登大河小說《浪淘沙》，以迄一九九〇年十月結集出書為止，前後花費約略十